



柏溪 新生

——我的回忆(十六)

李国栋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北京 100080)

1945年大约10-11月间,我考取中央大学开始新生入学。因正逢抗日战争胜利,学校准备复员,推迟了开学。我到沙坪坝入学报到后,才知道一年级新生部不在沙坪坝,而在嘉陵江对岸距沙坪坝还有约20里的柏溪。记得我是同高中同班同学老程一道从沙坪坝去的柏溪的。先到磁器口渡过嘉陵江,然后沿江边去柏溪。途中还遇到考取电机系的老柯,他是我家乡邻县蓬溪人,是从国立中学毕业的。柏溪新生院临近嘉陵江边,大部分校舍是抗战中新建的。宿舍一间住好几十人,睡的是上下铺大床。我幸运地被分配住下铺,免掉了每天爬上爬下的麻烦。

我们刚到柏溪就开始上课。工学院的课除各院系都共同选的国文、英语和三民主义外,就是理工科系共同选的微积分、物理和化学。但如果初试的数学成绩不好,进校后再考数学也未过关,便不能选微积分,而只能选高等数学。以后到二年级,由于还未学微积分,又不能选微分方程课和另一些课,这样一课挡住选另一些课,便不能在4年内学完必修课程,而只能在5年或更长时间学完必修课程毕业。同学们开玩笑说这就只能实行“5年计划”了。我还算幸运,数学和英语都考试过关,不需要“5年计划”了。但是在刚

开始上大学课时,还是有诸多不习惯的。首先是没规定的教科学,只有所谓“参考书”,上课听老师讲课必须写笔记,下课后才知道讲了什么,复习什么。记得当时的物理和化学参考书是英文的Duff著的物理学和Daming著的化学,需要从学校路边的售旧书广告选择价格便宜的地方去买影印旧书。一些同学在上过这些课后又把书再买出去,“一代传一代”。其次是课堂上老师讲课时,黑板上写的全是英文,口讲的是英语夹杂着汉语,同学们称这是“川汤”讲课。“川汤”在四川话里是混杂的意思,即英语同汉语混杂。我虽在中学里学习了6年英语,但几乎都学的是生活用语,数理化的专门词汇很少,故初听课时也颇感困难。直到经过相当长时间后,听得多了,又看了不少英文书,才逐渐过关而习惯起来。物理、数学和化学是理工科一年级的主要和重点课,不敢掉以轻心。因为这些课中若有不及格的,便不能选二年级的一些课,又影响在4年内毕业。

“三民主义”是当时任何院系学生都必须学习的政治课,但又是最不受重视的课。教师在上面讲课,学生在下面专心听课的不多,有的在看其他的书或笔记,有的甚至不去上课,而去江边吃牛肉面,享受一顿美美的早餐。我虽然也去上课听课,被称为“规规矩矩”的学生,但远不像听数理化课那样专心,只是从做学生时起就“循规蹈矩”惯了。

念工学院后才感觉到,虽然享受公费的待遇,但上的功课的确是既多又重的。即使是一年级,虽上的主要课是微积分、普通物理和普通化学,但一来要听过“川汤”英语讲课和看英语参考书的“外语关”,二来要应付不断袭来的习题和考试,就深深感到功课重和时间紧。不少人或半开玩笑地叫嚷“公费难吃”,或暗中考虑着“怎么办”了。我虽然经过不断努

力,每次都幸运地过了关,但也感到紧张,不敢掉以轻心。这样紧张地学习下去,有的同学对于学工程产生了动摇,觉得学习另外一系列如司法班,也可得到公费,而功课就远不像学工程这么难了。

中央大学是抗日战争中从南京迁到重庆的,是当时大后方的著名大学之一。我考上中央大学后,我全家和宝珊的伯父母(他们的家乡源县距南京仅90里)都为我高兴,说我学习很好。当时中大新任校长吴有训原是昆明西南联大的理学院院长,听说是有名的物理学家。我是很敬重科学家的。有一次吴校长给一年级新同学见面并作报告。报告的内容我已不记得了。但他在报告中讲的一件事我却始终没有忘记。他讲这件事的大意是:英国物理学家牛顿在任国会议员时,他在国会中很少讲话,只有一次他站起来讲话,说:“这屋里太闷了。我建议把窗户打开。”当时听吴校长讲到这里,同学们都笑了,我也笑了,但印象却很深刻。后来我考进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从事磁学研究,他是科学院副院长,常来我们研究所。一次我向他谈起我上中央大学时,他那时当中大校长,我曾是他的学生,听过他的报告。他笑着说:“我知道了,你的爱人不是在院图书馆工作吗?”这可能是当时我们的施所长告诉他的。施所长在1920年曾在中央大学上学,我到应用物理所参加科研工作,最初也是跟施先生从事磁性测量仪器的设计和吕泉古永磁合金的研究。

我是在抗日战争刚取得胜利不久进入大学学习的，同当时刚考入大学的人一样都满怀“八年抗战胜利后开始国家经济建设”的喜悦，特别是我们学工程的更是高兴。经济建设的重点不就是振兴工业么？我这个刚开始学习工程的青年真是从国家的前途、家庭的期望和个人的志愿都感到前程似锦而欣喜若狂了。但是，一直关心看报的我，在开学后却不断从报上看到国（民党）共（产党）和平谈判和许多地方发生内战的消息。八年抗战，我们这一代几乎是在战争中长大的，对于战争的苦难是有切肤之感的。我们是多么希望和平，多么向往建设和民富国强啊。在柏溪满怀激情学习中，从报上看到了和谈的消息，军事调处的消息，以及政治协商会议（后称旧政协）开幕的消息。当时我虽然整天忙于上课学习，做不完的习题，看不完的英文参考书，应付不完的各种考试，但只要稍有空暇，也还关心着时事看报纸。

记得过了 1946 年新年后不久，柏溪也出现了欢迎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呼吁停止内战的大字报。对于这些国事风云，我有时也仅是望望而已，很难得从头到尾读完。但是大字报越来越多，到了一月下旬，有些短的大字报标语很醒目，呼吁去政协会议请愿，要求停止内战，恢复和平。响应的大字报也很多，确是群情激愤。后来大约是学生自治会柏溪分会发出通知，说是 1 月 25 日联合重庆各个大学去城里政治协商会议开会的地方（上清寺）请愿，要求停止内战。去不去参加游行请愿，当时完全是自愿的，既无人要求你参加，也无人禁止你参加。那时我认为这是一种爱国行动，便自动参加了。记得在 24 日夜里，我们半夜就起床，吃了早饭后便出发了。我们是沿着嘉陵江边走向城里的，到快进城时才同从沙坪坝去的中大本校同学会合。会合后传来的消息说，吴有训校长也参加我们的请愿了，走在中大游行队伍的最前面。我听了这消息很兴奋，觉得连科学家吴校长也亲自参加，我们的国家是大有希望了。

我们从夜里步行几十里走到上清寺政治协商会议会场前，那里已到了好些学校的许多学生。大家唱歌呼口号，群情非常热烈。一些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出来接见了游行队伍。我记得当是中共代

表周恩来穿着一身黄色军大衣，讲的话很适合当时游行学生要求停止内战的心理，因而受到学生们的欢迎。但他讲话的具体内容却回忆不起来了。这是我第一次亲自见到周总理（这是建国后一直未改的称呼），就对他留下了很好的深刻的印象。其他讲话者记不得了。只记得还有一位东北代表莫德惠讲了话，他提到收复东北，大家很感动地不约而同地唱起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我和许多人都是流着泪唱这首歌的。

游行以后回到学校，又忙着上课和考试了。因为要复员迁校回南京，故需要提前放暑假。数理化课不像文科有弹性，需要赶课赶做习题，我们这些理工科学生又得埋头于功课中了。

但是内战并没有因为这次游行请愿而停下来。从报上看，内战还在扩大。不久，又出现了新的大字报，说一位在东北办接收的工程人员被杀害了。有说是被苏联红军杀害的。许多人听了很气愤，我们刚从日本帝国主义手里收复了东北，为什么我们的盟国苏联还这么不讲理欺负我们？这时学校的广播喇叭中又不时响起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歌声，还发起了二月廿二日的又一次进城游行，后称“222”游行。这时政治协商会议已经结束，游行是上街抗议苏军杀害中国接收的工程技术人员的。解放以后的政治学习中，称“125”为进步的学生运动，称“222”为反苏游行，这在当时的一般学生恐怕是不了解这些内情的。历史的确是十分复杂的。

1946 年 5 月前后，一些要复员外迁的大学便提前放暑假，并声称因为

复员搬迁的事情很多，下一个学年的开学也将推迟，希望同学们回家过暑假，等候学校的正式开学通知。在提前放暑假后，我从柏溪到了沙坪坝。这时我在南充中学的几位同班同学和遂宁同乡也已考进重庆大学念书，我可以住在他们的宿舍里，不再像一年前考大学时因没有相熟的重大同学而只能占教室的过道睡觉，不再担心丢掉竹席床单等卧具了。

我们省南中的同班同学曾在沙坪坝两次聚会欢送大学复员的班友。一次是老龚、老程、老刘、老李、老蒲、老谢（女）、老何和我欢送老张和老何班友去上海交通大学入学。另一次是老何、老万（女）、老谢（女）、老蒲、老李、老朱、老伍、老田、老刘、老苏 10 位班友欢送老邹去沈阳东北大学及老龚、老程和我去南京中央大学入学。因为至今我还保存着当时欢送会拍摄的合影，故能记清参加这两次班友欢送会的全体同学。这种欢喜合影留念的习惯几十年来我都一直保持着，因而留下了一生中许多值得怀念和纪念的人物和情景。这些照片经过“文化大革命”而能保留下来，的确是很不容易的。

（收稿 2000-05-10）

